

第七届两岸历史文化研习营（荆楚文化）研习心得

張昊蘇 南開大學文學院中國語言文學系博士生

起意报名“武汉营”，除对“荆楚文化”素有深厚兴趣外，还别有于公于私多方因缘。于私，则是讲授阵容中多有久已闻名的大学者坐镇，能够亲聆警效，自是难得的机会；又欲借此机会饱览湖北的人文风物，与新朋坐而论道，随旧友开拓胸襟。于公，则是被主办单位沟通文史学科知识交流的旨趣所吸引——学者们固然常说“文史不分家”，但就实际情况来看，不论是所受的学术训练、抱持的学术理念抑或可供参加的学术活动，学科壁垒终究森严，学术交流亦多滞塞。个人的学养虽然浅薄，然而借此机会转益多师，以所谓“文学研究者”或“文献研究者”的身份参与跨学科的讨论，再将所获的新知纳入本学科的研习中，相信这正是主办方所期待的思维碰撞，想来也正是一条治学通途。而在前后十一日的研习过程中，我在此方面确有一番新的体悟。

在一般的观念中，似乎史学研究多重视实证与考据，而文学研究多长于感悟与思辨。前者“笃实”而近乎“固陋”，后者则“轻灵”乃至“空疏”。但仅就我的亲见亲闻而言，其实近年来大陆的古代文学研究倒是很有乾嘉朴学气象，所治“文学史”的核心是“史”非“文”，不甚措意于新理论的引入和创造，反倒是史学界已经走在了领先的地位。在每晚的讨论中，当我苦于腹笥局促，无话可说的时候，同营学员看待问题的视野之大和角度之新令我深感钦慕，也因此大大受到一番观念上的洗礼和冲击。有时对于某个概念理解不同，大家还旁征博引中西著作，对其中的细微差别详加辩论，这种“咬文嚼字”式的功力学养更令我叹为观止。

密集紧凑的田野考察中别是一番感受。本以为“田野考察”容易沦为“观光旅行”的代名词，不料一路上历史景观与文献遗迹纷至沓来，自然风光虽然美妙，却已经无暇也无心玩赏。“面粉教”的魔力引人入胜，“华南”式的读碑生动地展现出几百年前的社会生活与宗教生态，当田野导师用一条主线贯穿貌似枯燥无味的史料时，看似毫无意味的文字仿佛也无孔不入地加进自己的知识结构乃至学术写作中了。文学研究不应与日常生活与物质文化脱节，这是我亟需补充的知识短板。

当然，应该特别提及、也令我特有反思的是同行前辈讲授的内容。在这次的课程安排中，与文学直接相关的题目较少，特别是完全未涉及楚辞与老庄之学，

未免令人遗憾。但胡晓真、刘苑如等文学专业的老师也已展示出台湾学者在古代文学领域的学术成就与理论建树，其治学取径各臻独妙，在材料的选择与解读皆开出不少新意，这与我日常所接触到的学术传统与学术训练大有不同，也令我意识到多方汲取各个学科理论方法的紧迫性。研习营后参访辛亥革命纪念馆，展厅中大书孙中山先生“世界潮流浩浩荡荡”之言，这也正是我在研习过程中所生发的感受。如果作为个人的学术选择，在理论与实证之间当然不妨畸轻畸重；但既然置身于“学术圈”这个大环境中，就不得不对各家各派的方法与旨趣都有些基本的了解，方能不断激活新的思想，与同行（或许是广义上的）进行良性的学术交流。

这次研习营有幸被分在“概念组”中，同组营员们不断提出新的概念，也激发出我对某些概念问题的粗浅思考。在发言中我曾提出“边界”的问题，尝试以此探讨明清之际的地方文化。然而“边界”其实是无处不在的，仅就研习班营员的专业出身来说，除却文学与史学的学科分野，不同朝代、不同领域、不同“派系”的研究也同样导致研究旨趣与学术语境的差异。上一辈人所津津乐道的“博通”与“精专”，今天看来边界虽然依旧有些模糊，却似乎有日趋分化之势。这种“道术将为天下裂”的状态，究竟是学术发展到“高精尖”的必然趋势？抑或亟需我们尝试加以拨转？这些问题令我甚感困惑，未来将继续思索。

若说遗憾，自然也有一些。我之前所理解的“荆楚文化”乃是一种不尽同于地理区划的概念，也就是“荆楚文化”是文化性质而非地理位置的概念，具有若干与其他地区文化所不同的性质。而此次实际的讲授与访查，似乎更侧重于以地理上的荆楚地区为标准，虽然选材的范围更为清楚明了，但当某些材料表现的内容具有相当的共性，并非荆楚地区所独有者，那么何为“荆楚文化”则反而令人费解了。当然，这里只是想说在个人的理解之中，深入探讨“荆楚文化”，正需要这两种思路的反复撕扯，才能进入更深层的思考。研习营的时间有限，而所涉领域又极为丰富，自然免不了鼎鼐难调的现象；且头脑运动只为激起思辨的火花，进一步的探索还需要长期的知识积累。希望自己能够不断进行学习、反思，以研习营所获的新知为基础，沿着这条思路继续走下去。

最后，自然是要感谢主办单位给予的学习机会，感谢授课老师的悉心指点，感谢工作人员的辛勤劳动，感谢诸位新知的关爱照拂。十一天来我收获了不少知识与友谊，希望未来还有缘分向各位师长同仁继续讨教。